

近代中国 东北移民研究

地域文明研究书系

高乐才 著



商務印書館

东北师范大学“十五·211工程”项目
“地域文明重点问题”结项成果

近代中国东北移民研究

高乐才 著

商務印書館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东北移民研究 / 高乐才著.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0.12

ISBN 978 - 7 - 100 - 07508 - 4

I. ①近… II. ①高… III. ①移民—研究—东北地区
—近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763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近代中国东北移民研究

高乐才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508 - 4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5/8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概 论.....	1
第一章 移民历史动因	39
一、关内北方省区移民的主要原因.....	39
二、东北地区吸纳移民的有利因素.....	57
三、移民鼓励政策的推动.....	71
第二章 移民与东北解禁	81
一、辽东招民开垦.....	81
二、东北封禁与弛禁.....	88
三、东北解禁与开放	105
第三章 移民人口考察.....	114
一、移民人口的迁入	114
二、移民人口的返籍	121
三、移民人口的内部流动	127
四、移民人口的估算	135
第四章 移民分布与结构.....	142
一、移民人口分布	142
二、移民人口籍贯	155
三、移民职业结构	162
四、移民性别、年龄结构.....	170

2 近代中国东北移民研究

第五章 移民的生活	175
一、移民的旅途生活	175
二、移民的现地生活	180
三、移民主生存条件与环境	195
第六章 移民与土地开发	203
一、自然环境和土地资源	203
二、清代东北土地占有形式	207
三、移民垦殖措施和政策	214
四、官荒土地的出放	225
五、移民土地的开垦	237
第七章 “移民实边”与实绩	252
一、东北边疆危机	252
二、“移民实边”思想及奏议	258
三、“移民实边”建议及措施	266
四、“移民实边”实绩	273
第八章 移民与东北经济发展	284
一、农业产量的迅速提高	284
二、商品粮基地的形成	291
三、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298
四、商业的兴盛和繁荣	318
五、农牧垦殖公司的兴建	325

概 论

我国东北系指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就在这块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建设着自己美好的家园。17世纪中叶，清政府对东北实行严厉的封禁政策，禁止关内人民的迁入，使东北一直处于极为缓慢的发展状态。进入近代以后，东北解除封禁，大批关内汉族人民为了求食求生迁居东北，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移民大潮。由于关内汉族人民大量的迁入，不仅充实了边疆，强固了国防，而且使东北的大片荒原得到了开发。同时由于关内移民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使东北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近代以来，关内的汉族移民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开发和建设了东北边疆，使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全面发展，改变了东北的落后面貌，为东北的现代化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一

移民是人类求取生存，谋求发展，或实现某种目的的一种社会现象，亘古以来即有之。“各国恒以殖民政策列为一学科，而研究之，视为一种专门学问。故其政策有如斯之进步，而日益加良。”^①

^① 《变通迁民实边办法之刍议》(节录津报)，《东方杂志》第5卷第3期(1908年)，第147页。

2 近代中国东北移民研究

关于移民方式,就世界范围而言,吴希庸先生认为“有四大方式:一曰侵入,为低级文化而富有强力之部落,成群侵入较高文化之国度;二曰征服,为文化较高民族向文化较低国度施行压力,其武力兼有强力文化力两种;三曰拓殖,以开辟属地为目的,派遣本国人统治之;四曰移民,为近代最主要之人口移动现象”。近代人口移动现象其特征有三:“第一,近代‘移民’为和平之人口移动。当一部分人决定他徙时,若经过缜密与合理之思考,必采择一适当之目的地,以求应最小之努力获得最大之成果,故近代人口之移动方向必趋于阻力最小之处,并避免使用武器或战争方法。且近代移民主要为个人行动,采取和平方式实为智慧之举。就移民收容地而言,应使当地居民认为外人来居为一种利益,至少不认为一种威胁。于移民史上,新开发之国度对于外人来居之态度常浮动于欢迎与拒绝之间,至于其态度之决定,则一视当地主人之观感如何而已——惟此观感亦因时代或环境之变迁而生变迁。当一地对于外人来居感觉威胁时,必设限禁之律,以遏移民巨潮,清乾隆以来对东北之封禁,美国仍在实行之‘移民律’,皆其例也。即在此时,有意移入者仍不能使用战争方法以达成其目的也”;“第二,近代移民为自动性的人口移动。自由人之行为皆导源于自觉,自觉而生自动。自觉自动故不能脱离环境之支配,但并非由于人为之命令,且为高出本能行动以上之行为动力。近代所以离乡他徙者,实由于对故乡之不满与迁地为良之自觉,其迁徙也,为自动之行为,非古昔随群体迁徙者可比。于近代移民史中,固不乏政府或社会团体提倡之例,然并非出于强迫,不过协助个人更易于达成其目的而已”;“第三,近代移民为开发性的人口移动。开发新国度蕴藏之资源与统治殖民地,虽往往为前因后果之关系,但前者可以独立进

行。中国之于南洋一带，开发之功，举世公认，但吾人未尝操其统治之权；汉人实为东北开发者”。^①

各国移民种类，有政治上移民，有军事上移民，有农业上移民，有经济上移民。我国东北关内移民，“自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经济上占有势力，则政治上、军事上、农业上无不占有势力”。^②

关于导致移民的社会现象，英人拉文斯坦认为，移民的原因是社会的“推力”和“拉力”所造成的，即谓之“推拉理论”。“推拉理论”不外乎有三种因素：一种是移民原住地的“推力”；二是移民现住地的“拉力”；三是移民原住地和移民现地的合力。这一理论的提出虽距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但仍被人口研究的学者们所运用，特别是在西方国家较为流行。但这一“推拉理论”只是对人口流动的简单的理论概括，至于移民动因还要根据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群和时空的不同而进行具体的分析。移民原住地的推力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自然环境。社会原因包括多方面，如战乱、灾荒、治安、人口、土地等，是影响移民的主要原因。自然环境在人们最初的定居选择中认为是理想的生活家园，但随着气候的变化，人为的环境破坏，使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生存遭到威胁，迫使人们重新选择。在迁移的人口中，有的人可能是因为社会原因，有的人可能是因为自然环境，但不论哪一种，原住地自然有移民感到生存不利的条件。

移民行动的选择，绝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资本的缺乏，语言、风俗、民族、宗教的不同，都足以成为人们迁

^① 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东北集刊》1941年第2期，第5—6页。

^② 《变通迁民实边办法之刍议》（节录津报），《东方杂志》第5卷第3期（1908年），第146页。

移的障碍。更何况在中国安土重迁的观念深入人心,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远离故土。安土重迁的观念,中外如一,如没有对其有力之因素,则不可能促使人类离乡他徙。考察其原因,十分复杂。但有两点是最基本因素,即原住地的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不利和迁移后可能获得的利益与满足。就故土对人们的牵系力而言,驱逐性的原因更为重要。除非有特别诱人和勾人魂魄的事物与环境,才能使人离开世代生活的故乡,否则不会做出迁移的决策。如果人们对其故乡确实满意,则离乡他徙之事将成为不可思议。因此,人们迁徙他乡必然是对现状有所不满,始能促成。尽管到了近代,人们的观念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有令其不安于固有的生活,而发生一种见异思迁的倾向,追求一个较优良的环境”,但大多数人仍然固守传统的观念。“中国生齿日繁,民食为艰,仍无多迁徙现象者”^①。

人口的迁移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但经济因素最为重要。迁移的人口不论是自发的还是政府行为的,不论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多是为了经济因素。通过移民,缓解移民原住地人口过剩,经济危机,开发移民现住地的资源,发展移民现住地的经济,解决生产资料、劳动力与经济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矛盾。当然,政治因素也经常影响、促使人口的流动。总之,天灾人祸是导致人口流动的最根本的原因。

交通的便利与否也与移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到 20 世纪初,东北三省内铁路的长度,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和印度。与关内的交通,则有北宁铁路和大连、营口两大海港。交通便利为移民的迁

^① 吴师圣:《中国国内外移民之检讨》,《户政导报》第 2 期(1945 年),第 67 页。

徙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西北虽然地广人稀，但交通不便，到 20 世纪 30 年代铁路仅有平绥路一段，长 670 华里，最西只达包头。同时，西北各省土地贫瘠，生活在那里的人民已是十分的困难，当然华北地区的灾民决不会舍近求远，到极其贫困的大西北去。通过比较，不论从自然条件还是水陆交通，最佳选择是东北。因此，清末以后，特别是民国时期，关内北方省区的人民迁移东北形成一种社会潮流。

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绝大多数来自关内北方省区，进入近代以后，这些省区兵连祸结，灾害频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山东、河北遭到了列强的杀戮和铁蹄的蹂躏，饱受战争之苦。太平天国战争，太平军和清军激战了近两年之久，战火燃烧了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四省。清末以来，内乱外患纷至沓来，长期征扰，民不聊生。民国以来，内战不息，大小战争达数百次之多，田地被毁，房屋被焚，死伤人口无数，百姓遭殃。人民为躲避战争，四处逃亡，目不忍睹。

特别是山东、河北两省在军阀统治时期，军阀混战，连绵不断，波及地区之广，残害地方，破坏生产，荼毒生灵。不仅是战争的重灾区，而且也是军阀为了发动战争进行征收钱粮、物资和征调兵夫的主要地区。据陆军部 1925 年统计，“年经费是二亿六千多万元，几占总开支的二分之一”。^① 军阀所到之处，洗劫一空。再加上军阀本身奢侈淫靡生活的挥霍，耗资更加庞大。这些巨大的开支，完全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他们利用勒征苛捐杂税、滥发纸币、摊派兵差等手段，聚敛钱财。

^① 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3 页。

我国关内各省，因人口过剩，无地谋生，遂发生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现象，号称以农业立国的国家，“每年洋米进口自九千万两以至一亿万两，洋面则自四千万两以至五千万两”。^①这种巨额的农产物的输入，不能不说明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农产品的危机。这种状况，当年尚可勉强挣扎，一遇凶年，老弱者只有坐以待毙，强壮少年或辗转流离，或流为盗匪，或投入行伍。匪与兵年年增加，遍地皆匪，全国皆兵，兵祸匪祸，辗转相寻，造成社会极度恐慌。

我国关内北方省区在历史上一直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而灾与荒又相互联系，有灾必有荒。灾荒的结果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摧残，导致灾害更加频繁，以至造成恶性循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灾荒不但在空间上日益趋于普遍化，而且在时间上也愈见普遍。其结果形成了无处无灾，无处不荒，无年无灾，无年不荒的现象。据统计，山东、河北、河南三省自 1823 年至 1911 年的 88 年间，就有 7400 多个县次遭受各种自然灾害，其中山东、河北两省就有 67 万多个村庄。仅“1877—1878 年的饥荒使河南、山西、山东、直隶四省约有八百万人死亡”。^② 1898 年，黄河溃决，山东大部分地区遭受水灾，受灾区域达 50 余县，淹死人口 6 万余人，冲毁房屋无数。^③ 广大灾区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民国以后水旱灾害更不断发生，被灾面积之大，被灾人口之众，灾民满目，哀鸿遍野。灾区人民不得不成群结队，携儿带女，逃离家园。

① 钟悌之：《东北移民问题》，上海：日本研究社 1931 年版，第 21 页。

②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统计》（1901—1920）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2 页。

③ 邓拓著：《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 页。

同时关内北方的山东、河北、河南等省区人口经几千年的生殖和繁衍，“生齿日繁，人口密度甚高，于是地狭人稠，谋生不易”。^①如山东省，1840年人口已达到31987566人，^②20世纪20年代，“人口密度，每方里约有二千七八百人，为我国全国人口密度最浓厚的地方。山东的总面积，十分之六是山陵起伏，十分之四是平地。但平原生活的住民的比例还算是很多的。其中最稠密的地方为济南府东南，与青岛附近，所谓胶州湾的一角”。人满为患，土地饥饿，人均耕地不到3亩。

此外，由于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以及特权，把大量鸦片、商品输入到中国，使中国固有的自然经济基础陷于瓦解。许多城市手工业被迫停业或倒闭，手工业工人沦为失业者。农村家庭手工业也遭到严重破坏，生活更加贫困。而清政府的封建赋税剥削，又因弥补战争赔款，有增无减。于是山东、河北、河南一带的灾民、破产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纷纷向外迁移，求取生存。

中国由于人口膨胀，天灾人祸并起，特别是中原地区的人口大量向外迁移。迁移国外的移民遍布世界各地，由于国弱民穷，到处皆受排斥。中国迁移国外的移民“大部分都是苦力，总数约达一千万人，或说七八百万，或说只有四百五十万，无论如何，总是非常多的数目这是不容置疑的”，其中广东、福建两省的人民移殖外洋的最多。在国内的移民中，“观其状况”，以“满洲为最多”。^③在东北

^① 龚维航：《清代汉人拓殖东北述略》，《禹贡》第6卷第3、4合期，第110页。

^②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7页。

^③ 徐恒耀：《满蒙的劳动状况与移民》，《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第30—31页。

的关内移民中,又以山东、河北、河南等关内北方省区为最。

而东北地域广大,人口稀少,面积达 100 多万平方公里,1840 年时,东北三省加在一起也只不过 300 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 6.13,黑龙江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 0.54。而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区的面积不过 50 多万平方公里,同时期三省人口已达到近 7800 万人,山东人口密度已达到 207.71。山东、河北、河南三省的人口是东北三省人口的 26 倍,人口密度是东三省的 24.68 倍。

到 19 世纪末的 1898 年,东三省人口:辽宁为 550 多万人,吉林为 82 万多人,黑龙江为 126 万多人,总人口为 760 多万人,人口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为 14.56,黑龙江只有 2.73 人。同时期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总人口为 8850 多万人,人口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为 171.55,人口密度最多的山东已达到 246.24 人,人口密度最小的河北也突破了 100 人,达到了 111.33 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的人口是东三省人口的 11.6 倍(11.6447),人口密度是东三省的 11.78 倍。两个地区的土地面积相差一倍,人口总数和人口密度却相差十多倍,差距之大。^①

东北不仅面积广阔,人口稀少,而且可耕地达 4 亿亩。“满洲北部有松花江、嫩江两大河流,南部有辽河,所以在地理上形成一个松辽平原,连亘于黑、吉、奉三省之间。土地的生产力,实不让江、浙两省最饶沃之地。”^②1925 年东北已有耕地人均达 8 亩之多,而同时期的山东人均耕地不到 3 亩,况且开发了几千年的山

^①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 503 页。

^② 执无:《直鲁移民与满洲经济》,《现代评论》第 6 卷第 132 期(1927 年),第 544 页。

东，已没有再开发的余地。东北矿产资源，森林资源丰富，为世界各国所注目。“满洲地广人稀，物产丰富”，到了近代“不但日人垂涎欲占为已有，且已成为世界各个国注意的问题”。^① 美国人称东北是世界最膏腴的地区，是“中国的花园”。日人称东北是远东最适宜的农业区域，“其利源富藪，实在无穷尽”，为“日本的阿美利加”。^②

而东北与关内的北方省区的河北、山东地域毗连，交通便利，由河北乘京奉铁路列车只需一夜的时间就可到达东北。山东与东北隔海相望，由烟台到大连只有 90 海里的距离，这一舟之便也使山东的移民毫不费力地到达东北。这一切“也是十二分足以引起一般苦力越海而来的雄心”。“足以使当时直鲁苦力出关的重要原因”。^③

近代以来关内北方省区的天灾人祸，造成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再固守安土重迁的观念只能是坐以待毙。于是，人们选择了逃生。东北三省既有广大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而人口又很稀少，正是关内北方省区人民迁移的最佳之处。因此天灾人祸交迫的关内北方省区的人民“本来无处谋生，于是都来找到这个新天地来从事移民垦殖”。于是，东北便成为关内北方省区人民“谋生的新大陆”。^④

^① 梁敏时：《满洲之富源——农矿与森林畜产》，《新亚细亚》第 2 卷第 3 期（1931 年），第 45 页。

^② 钟佛之：《东北移民问题》，第 7 页。

^③ 执无：《直鲁移民与满洲经济》（续），《现代评论》第 6 卷第 133 期（1927 年），第 566 页。

^④ 张振之：《人祸天灾下之山东人民与其东北移民》，《新亚细亚》第 2 卷第 3 期（1931 年），第 39 页。

二

明末清初，东北战乱达 20 年之久，汉族人民纷纷逃亡，居住在辽河流域的逃归关内，居住在东部地区的逃入朝鲜境内，东北汉族人民已寥寥无几。东北各少数民族也因服役清军，遂使人口减少。清入关后，“从龙入关”者近百万，东北人口更是锐减。“自清定天下以后，顺治十年，为救济东三省之荒废起见，下辽东招民开垦令；并奖励移民，汉人遂又移住辽东一带，流民更深入其内地。清室虑汉人侵其故土，康熙时，乃施封禁，于山海关严行管理，划境界于柳条边墙，设边门于要地，以防越境者；然汉人之移住，不因此而中止，由山东渡海而来者，仍日益加多。”^①

乾隆四年(1739)，清政府颁布政令，允许奉天(辽宁)、吉林移民入籍。乾隆五年(1740)，严令取缔移民，但对“已入籍的移民须具保证，不愿入籍的移民，限十年之内回籍”。乾隆八年(1743)，天津、河间府等地惨遭大旱，灾民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流出者甚多。清政府在此特殊情况下，为安抚灾民，下谕开禁。“乾隆八年六月丁丑，准流民出口就食。”这是封禁政策施行后的第一次开禁。乾隆九年(1744)，因当年山东、河南、天津等处被灾难民之众，纷纷出关就食，乾隆帝诏谕变通办理准许灾民出关，便有第二次开禁。乾隆五十七年(1792)，河北大旱，无数灾民从古北口、山海关、张家口、喜峰口各边隘出关求食，乾隆帝再次诏谕变通办

^① 王慕宁：《东三省之实况》，中华书局 1929 年版，第 3 页。

理，又有第三次开禁。“直到嘉庆八年，封禁政策，更为严厉，凡山海关以外，概不许流民居住”。^①

道光时期，继续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不仅没有松弛，反而变本加厉，对移民的监督更加严格，并设置卡伦以阻止移民进入。清政府在东北所推行的封禁政策，直至咸丰末年才渐趋废弛，但并未正式撤销。

咸丰末年，吉林省双城堡、拉林、舒兰河流域，及吉林西部因渐被民人开垦而开放。同治初年，伊儿们河流域及长春东部之桦皮甸子允许移民垦殖。此后，禁地围场陆续开放。光绪三十四年（1908），黑龙江将军恩泽，“鉴于甲午战败，俄筑东铁，以及种种外力的侵迫，始所谓‘龙兴之地’，不能任其地旷人稀，永保神秘，乃请准清廷实行移民放荒，于是满洲封禁政策，始完全撤废”。^②“数百年封禁之地利，遂至荡然无存”。^③辛亥革命，清帝逊位，民国宣告成立，“满人之势力，一扫而空，汉人移住之束缚，悉被除去”。^④此后，关内北方省区人民迁徙东北者如潮，一方面是移民者为自身生存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是政府的提倡与奖励政策，以及社会上慈善团体的援助，使移民形成了一种社会趋势。

据民国时期统计报告载，20世纪20年代“每年移住者由五六十万起八十万止。积三十余年不断之迁入境，致成今日之现象，是移民大有造于东三省也”。^⑤东北移民最高潮时期为1927—1929

^① 钟悌之：《东北移民问题》，第28—31页。

^② 同上，第36页。

^③ 《清实录》第50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341页。

^④ 王慕宁：《东三省之实况》，1929年版，第4页。

^⑤ 南阳：《如何开发东三省》，《中东经济月刊》第6卷第8号（1930年），第10页。

年,1927 年,移民人口竟达到 1050828 人,年末离开东北返回关内者为 342599 人,留居东北的人数为 709229 人。1928 年移民人口为 938472 人,年末离开东北返回关内者为 394247 人,留居东北的人数为 544225 人。1929 年移民人口为 1046291 人,年末离开东北返回关内者为 621897 人,留居在东北的人数为 424394 人。^①三年间东北关内移民竟达到 3035591 人,就是出去年底返回关内者,仍有 1676848 人,年均定居者 558949 人,可见移民如潮。近代东北关内移民,特别民国时期的移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运动”。^②

综观近代东北地区关内移民,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人数众多,仅近代的移民就达千万人以上,其中并不包括移民在东北所繁殖的人口。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各国的区域中也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移民地区。但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基本上是自由移民,处于无序状态,因此存在着诸多问题。

第一,移民人口分布不平衡。尤其是清末以前,移民因交通的不便,基本上定居在辽宁,很少北上。他们“仅仅靠着步行或牲口,要从灾地里逃出来,很是困难;而且逃难的人民,在他们往适于移殖的地方去的路上,又需经过金钱食物两告穷乏,不能供给他们生活资料的区域,这也不免有困难之处”。同时对东北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总存在着特殊的畏惧和憎恶”。而且“这些地方是边防恐怖的区域,不是可发展有希望的区域。因此,那时

^① 张振之:《人祸天灾下之山东人民与其东北移民》,《新亚细亚》第 2 卷第 3 期(1931 年),第 42 页。

^② 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21—1927)第 2 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638 页。